

人喚神卷新榮

与竹精怀默乘

过巴镜酒默佛

诗被明谢无与

持恐分永甯渐

力老字晚旧误

中雅文抱言教

眼风重冰言濡

尽悲落甘有惊

静自零坐徒始

孟郊诗集笺注

郝世峰 笺注



孟郊诗集笺注

郝世峰
笺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郊诗集笺注/(唐)孟郊著;郝世峰笺注.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ISBN 7-5434-4618-9

I. 孟… II. ①孟…②郝… III. 唐诗-注释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097 号

书 名	孟郊诗集笺注
作 者	郝世峰
责任编辑	孟保青
特约编辑	张采鑫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开发区海河道 29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618-9/K·195
定 价	23.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说孟郊^{*}

(代前言)

在崛起于中唐诗坛的追求怪奇风格的诗人群落中，孟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钟爱怪奇、面向世俗、宣泄抑郁，是这个诗人群落的共性。在这一共同倾向之下，孟郊诗以其独具阴郁狼峭的风貌而极富创造性、开拓性。他的风格，即使在全部唐诗的历史中，也是迥不犹人的。治中唐诗歌史愈是深入，便愈会发现孟郊对于诗歌发展的意义也许并不下于韩愈；“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李肇《国史补》），“时号孟诗韩笔”（赵璘《因话录》）等唐人的记叙，皆可再三寻味。对孟郊其人其诗的研究似应再详密些，再深刻些。

一、从“立身如礼经”到“始惊儒教误”

——孟郊的心灵历程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

^{*} 本文主体系作者与罗宗强主编之《隋唐五代文学史》（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六编第二章第一、二节。

孟郊诗集笺注

人。早年与皎然、陆羽等人交往，参加过湖州诗会的活动。曾旅居河阳（今河南孟县），侨寓苏州等地；在苏州识韦应物，有赠诗。^①从贞元七年（791）起，三次应进士试，贞元十二年（796）始登第，时已四十六岁。贞元十六年（800），初仕溧阳（今江苏溧阳县）尉，因不屑俗务，不治官事，被罚半俸，于贞元二十年（804）辞官。大约从贞元七年以后，他在长安、洛阳等地相继结识了韩愈、李观、李翱、张籍等人。与韩愈、李观相知尤深，李观早死，韩愈便成为孟郊的终生知己。由于韩愈的推荐，孟郊于元和元年（806）入河南尹郑余庆幕，职司河南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随即定居洛阳。四年以后，解职居母丧。元和九年（814），郑余庆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孟郊受聘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是年八月，赴任途中暴卒于阆乡（今河南阆乡县）。孟郊出身寒微，五十岁始为官，两度为官的时间都不长，总共六七年，而且县尉与幕职在一般士人心中不过是“局促尘末吏”（《送魏端公入朝》），与未曾居官也相去无几。所以，孟郊作为士人，并无宦业可言，并且终生贫困，甚至衣食仰人。在为郑余庆宾佐以前，先后曾依附过陆长源、韦夏卿等。死后治丧并遗孀生计，也是全靠郑余庆、韩愈、樊宗师、张籍等人集资操理的。

孟郊笃信古道，有以古律今的倾向。诸如“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投所知》）、“君子耽古礼，如馋鱼吞钩”（《魏博田兴尚书听嬖之命不立非夫人诗》）等以古道、古礼为人生

① 据《石淙十首》、《独宿颍首忆长安故人》、《旅次湘沅有怀灵均》、《游韦七洞庭别业》等诗，孟郊当有朔方、湘楚之游，但时间不可考。华忱之《孟郊年谱》谓孟郊于贞元九年（793）下第后，自长安出游朔方，自朔方远游湘楚，复自洞庭改往汝州。时间不足一年，行程数千里，如无特殊缘由，似过分匆忙。

之规矩准绳的言谈，在他的诗集里屡见不鲜。韩愈称赞他：“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孟生诗》）又称他“行古道，处今世”，“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与孟东野书》）。卢仝说他“传古道甚分明”（《孟夫子生生亭赋》）。贾岛说他“才行古人齐”（《吊孟协律》）。举凡孟郊朋辈，差不多都以好古、行古道去赞美他。甚至对于冠以“古”字的词语，孟郊也是情有独钟。“古心”、“古礼”、“古交”、“古义”等，络绎不绝地出现于他的笔下。

孟郊所谓古道，基本上是指儒家伦理，但是也融合了一些接近老子思想的应世态度。约当贞元末，他在《上常州卢使君书》中曾备陈“道德仁义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的信念，力主士人应以修身为本，以道德仁义事君养亲。在《又上养生书》中，又高谈“身以及家，家以及国，国以及天下”的修身之道。这些言论，都是源于儒家的古训。在孟郊先后依附过的几个人当中，韦夏卿“深于儒术，所至召礼通经之士”，郑余庆“好古博雅”，“专欲振起儒教”，都以尊儒好古著称。（见《旧唐书》韦、郑本传）孟郊之受知于他们，自然是建立在这个基点上的。

依照孟郊的信念，行儒道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国家赖以兴旺的基础。因此，无论要求自身，还是知人论世，他总以儒家伦理为标准，着眼于用道德去规范人格。乐府《静女吟》有如下表述：

艳女皆妒色，静女独检踪。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

君子易求聘，小人难自从。此志谁与谅，琴弦幽韵重。

诗中托静女以明志，表明他的做人准则是以礼自任，以德应世（事人、事君），近君子，远小人，言行皆中规矩。其中“独检

踪”即自我制约，是统摄全诗的基本思想。所以韩愈说孟郊“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荐士》）；张籍《赠孟郊诗》也说“君生浮俗间，立身如礼经”，都赞扬孟郊用儒家道德以律己。李观向梁肃推荐孟郊时，赞他“其行贞”；李翱向张建封推荐他时，也直称他为“贞士”。孟郊之为合乎儒家规范的正人君子，在孟郊的朋友中众口无异词，由此可见他对于奉行古道的态度之认真。不过，有时因拘泥不化，趋于极端，也出现一些愚顽之见。如《旅次湘沅有怀灵均》，责备屈原不忠不孝，不足为楷模，甚至直斥屈原为“小人儒”。唐人评屈而偏颇固鄙一至于此者，是为仅见。^①

在《静女吟》中，被孟郊否定的是以艳女之“妒色”、“任妆”、“嫁容”所比喻的相互竞争、自我表现、自我夸耀。在对于士风浮薄、华而不实的否定中，含有主张静定不争的倾向，接近老子的某些思想。孟郊在大量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应世态度是，既守道不移，又静而不争。这是他的政治哲学，也是他的人生哲学。无论慨叹世运凌夷，还是感慨世风日下，其立足点都在于此。例如对于骄兵悍将的叛乱，他当然是反对的；可是对于被视为正义的战争，他也不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寒溪九

①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云：“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但孟郊对屈原并无确定一贯的态度。《湘弦怨》：“嘉禾忌深蠹，哲人悲巧诬。灵均入回流，靳尚为良谋。”《楚竹吟酬卢虔端公见和湘弦怨》：“一掬灵均泪，千年湘水文。”均对屈原持肯定的态度。大约抒发愤懑时便引屈原为同调，欲明古道而拘泥于儒家伦理时，屈原便是不足为楷模的小人儒了。

说孟郊

首》之六)。无论怎样的战争，都是与仁义不相容的。《吊国觞》写道：“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竞争。”认为战争生于竞争。所以，他十分赞成“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送韩愈从军》）。

在对待士风不振方面，守道不移、恬静无争的态度表现得更充分。以下是他反复表达的思想：

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

（《长安羁旅行》）

君子山岳定，小人丝毫争。多争多无寿，天道戒其盈。

（《秋怀》之八）

砥行碧山石，结交青松枝。碧山无转易，青松难倾移。

（《答友人》）

松柏死不变，千年色青青。志士贫更坚，守道无异营。

（《答郭郎中》）

所有这些，都是主张用恬静无争、守道不移去克服“浮情无定主”、“利心朝朝新”的驰逐喧竞。在孟郊看来，这种静、定、方、直的持守，既是匡正衰俗的途径，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努力。《择友》诗云：

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

孟郊诗集笺注

里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若是效真人，坚心如铁石。不谄亦不欺，不奢复不溺。面无吝色容，心无诈忧惕。君子大道人，朝夕恒的的。

这首诗激切地表达了孟郊对于人间巧诈的感受。他理想中的“君子大道人”的生活态度，是不谄不欺，无诈无忧，没有机巧之心，还要不计较得失，欲念不逞。没有欲望，免生争逐和巧诈，就可进入还真归朴的人生境界了。他在《吊元鲁山》诗中就是从这样的理想角度去赞美元德秀的：

……君子耻新态，鲁山与古终。天璞本平一，人巧生异同。鲁山不自剖，全璞竟没躬。

（《吊元鲁山十首》之一）

君子应如浑金璞玉，天性自然，无欲无争，虽有美质，却不做自我表现。如果运用巧智，力求表现自己，生出高下异同的竞争之心，即所谓“自剖”，结果必将导致社会纷乱：

自剖多是非，流滥将何归。奔竞立诡节，凌侮争怪辉。……

（《吊元鲁山十首》之二）

“自剖”生出奔竞、凌侮、纷争，生出种种虚伪欺诈、稀奇古怪的事情。只要有个人欲求，士人即无高节，社会即会动乱；只有无欲无争才是人生应有的境界，社会生活才会因此宁静有序。这已经是明显的老子思想了。

总之，孟郊的应世态度是，既立足于以儒家道德去规范主体，又采取老子无欲、无为的思想去制约个体。他虽然自称“名姓挂儒宫”（《夏日谒智远禅师》），却非淳儒。他这套孔、老杂糅的思想，只是一种具有一定空想性质的人生理想，用它去解决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不过是迂阔其事。韩愈对这一点似乎看得比较清楚。他在《答孟郊》中说：“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孟郊执着孔、老之道以应世，世事却不依孟郊的愿望而折转其行进的方向。理想与现实扞格不入，而孟郊又认真得近乎执拗。“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的愤激之谈，表明他不但与“今人”，而且与“今世”都已处于极端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不能收到匡正时俗之效，却使他自己陷入了“出门即有碍”（《赠崔纯亮》）的困境。韩愈做过这样的比较：“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醉留东野》）与孟郊白首不得官、潦倒而自是相比，韩愈自愧弗如，并且自认奸黠。这种钦佩与自谦，在客观上反映了韩愈应世的态度比孟郊更现实一些，更多一些灵活，所以境遇比孟郊要好些。孟郊多次自称“愁人”、“愁叟”，这个包含着愤激、自负、自嘲的称谓，也意味着他与现实的齟齬不合，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于现实之外。他空有“不争”的愿望，却对世间争逐无可奈何，愤慨之余，常常茫然悲叹：

愁与发相形，一愁白数茎。有发能几多，禁愁日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四蹄日日多，双轮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营营。

（《自叹》）

置兵、置名都不是战乱频仍、人心倾险的原因，因此，“不置兵”、“不置名”只是无谓的假设，“安能免营营”也不过是无奈的虚叹。诗人茫然不解的是，“天”生的“不平”、“不清”是不能改变的，人间的车马奔忙、竞逐不已，是人自己造成的，却为什么不能克服？这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无欲无争的愿望之于现实，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孟郊虽然主张无欲无争，可是营营名利就连他自己也不能免。他热衷科举，渴念入朝为清职。《灞上轻薄行》写及第前为功名趋走的情况：

长安无缓步，况值天景暮。相逢灞浐间，亲戚不相顾。自叹方拙身，忽随轻薄伦。常恐失所避，化为车辙尘。此中生白发，疾走亦未歇。

已经追随“轻薄伦”去“轻薄”了，还在“自叹方拙身”；虽然在心理上有点儿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但在行动上却不敢怠慢，“疾走亦未歇”。这种进退失据的惶惶之态，令人感到酸腐好笑。由于屡试不第，他曾痛苦得“情如刀刃伤”，眼望着权富之家，发出以下感叹：

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

（《长安旅情》）

及至登科以后，他的心情即刻大变，在《同年春宴》中说：“永与

沙泥别，各整云汉仪。”《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中也写道：“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拾。”好像马上就能青云直上，永与卑贱告别了。所以，他高兴得“视听改旧趣，物象含新姿”（《同年春宴》），换一种眼光看世界了。在《登科后》中写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这种飘然陶醉的情态中，无欲无争、自我制约的人生态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孟郊的得意，在其一生中，只在登科后短短的一段时光。及至吏部铨选，仅得溧阳尉，自此以后直至老死，他的心境总为个人求发展而不可得的痛苦与怨愤所充积。因此，要守道不移，要无欲无争，首先就要正视自己的感情、欲求。这当然是一桩非常痛苦的事。《秋怀》之十四写道：

黄河倒上天，众水有却来。人心不及水，一直去不回。一直亦有巧，不肯至蓬莱。一直不知疲，惟闻至省台。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今寒皑皑。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薜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

人心所向，不务高洁，惟求功名利禄，这就是“失古”——古道沦丧。诗人要坚持古道：“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称执着古道为“忍古”，意味着执着古道必须耐得住寂寞，禁得起诱惑，受得住煎熬。忍，是个沉重的字眼，它表明孟郊活得何

孟郊诗集笺注

等艰难。不过既然是“忍”，也就是说，个人欲望实际上并没有被消灭，只是消极地忍耐、克制而已。功名欲望仍然在忍耐中挣扎着，事实上它是忍不住的。孟郊对诗歌创作的功利主义追求即是证明。

孟郊对诗歌的功能、意义的看法，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首先，基于“心追古人而从之”的好古倾向，他主张“文高追古昔”（《游韦七洞庭别业》），诗要“言语多古肠”（《吊卢殷》之十），诗人要“怀抱多正思”（《答友人》）。他在《赠郑夫子魴》中说：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诗人必须以圣贤之心为心，才会有与造化同一的精神气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探得宇宙之精微，获得创作的自由。说得简单点儿，便是先道德而后文章；只有道德高尚，才可能成为诗人，这是孟郊论诗的基本观念。从这个观念中产生了“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答友人》），标举雅正和出俗的说诗宗旨。关于雅正、出俗的内涵，他在《读张碧集》这首评诗之作中有所陈述：

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高秋数奏琴，澄潭一轮月。谁做采诗官，忍之不挥发。

复兴六义，以证兴亡，即是“雅正”的要求；整体风格刚健有

风骨，即是“出俗韵”的标志。^①这种并不比传统的成说多出什么新内容的理论主张，只是孟郊主观意愿的理念反映。它的主要作用，是使他自觉地追求诗歌创作的社会功利性，而又远离浮靡疲软的诗风而自立。

孟郊远离疲软诗风在实践中的明显表现，也是主要表现，是在体裁方面。在诗歌写作中，他厌薄近体而独擅古风。“自谓古诗量，异将新学偏”。（《寄陕府窦给事》）所谓“新学”，就体裁而言，主要是指与声律关系密切的近体诗。他曾感叹“古吟将谁通”，并说：“习乐莫习声，习声多顽聋。明明胸中言，愿写为高崇。”（《秋怀》之十）把古与今、崇高思想与声律都当作对立的两极看待，厚古薄今的态度异常鲜明。所以，在孟郊现存的五百多首诗中（联句不计），绝大多数是五言古诗和乐府，偶见近体，也不严守格律。这是“文高追古昔”的主张在体裁运用方面的明显表现。

“文高追古昔”，作为一种不离成说，没有多少创见的理论，拿到诗坛上去讲一讲，是不会激起多大反响的。可是，在写作实践中厌薄声律、屏弃近体、独取古风的倾向，却与时风相抵触，不仅为流俗所讥诮，而且在孟郊的人生道路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科举以诗取士，是以近体为标准，孟郊之厌薄近体的创作倾向显然是与科试要求相抵触的。他屡试不第、及第后仕途蹇涩，应与这一矛盾有很大的关系。韩愈《答孟郊》曾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依照孟郊一再申说的守道不移、恬静无争的人生哲学，孟郊对此本可漠然视之，不生计较的。可是，他却为此终生不悛，怨痛不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待诗歌的态度是完全功利主

^① 关于此诗作者，学界有新说。详见本书卷九《读张碧集》诗笺。

孟郊诗集笺注

义的。他不仅如上所述，赋予诗歌以社会功利主义的意义，而且还把诗歌作为服务于个人功利主义要求的事业去对待，个人名利同写诗直接发生了联系。在《送魏端公入朝》诗中，孟郊说：“局促尘末吏，幽老病中弦。徒怀青云价，忽至白首年。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写诗、为朝官、补风教三者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诗具有补风教和用以求官的双重功利价值，官职则是补风教的条件，也是补风教的意义被承认的标志。在这套完整的功利主义的人生价值取向中，诗的价值与人的价值被混而为一，无从区分了，而科场与官场的名利得失、荣辱沉浮也成了诗与人的价值标尺。

基于这样的思想，孟郊的功名欲望是强烈的。未及第时，他在一首诗中说：

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

（《夜感自遣》）

科举不中，不是因为诗写得不好，而是由于“清桂无直枝”——科场曲邪不公，好诗被埋没了。他夜以继日地苦吟不已，甘愿健康受损，就是为了洗刷这不堪忍受的耻辱。即使为此耗尽心血而死去，临死时仍为蒙受着仕宦无成的耻辱（即“死辱”）而痛苦，也不过是绵亘之际的“片时痛”，比起“生辱长年羞”——天天都在耻辱的折磨中要好过些。总之，不能以写诗登第，耻莫大焉，生不如死。再如下面这首诗：

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抱山冷飐飐，终日悲

颜颜。好诗更相嫉，剑戟生牙关。前贤死已久，犹在咀嚼间。以我残杪身，清峭养高闲。求闲未得闲，众谤瞋瞋瞋。

(《懊恼》)

好诗理应得官，也只有得官方能见出好诗的价值；然而现实却是“好诗空抱山”，得官的倒是恶诗，这就把写诗与做官的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诗人既要“清峭养高闲”，却又为“空抱山”而“终日悲颜颜”，正表明他的功名之念难以消解。在“求闲未得闲”的原因中，对功名不肯等闲视之，亦即自己内心的不能“闲”，应该是占第一位的。

从“写诗—为朝官—补风教”的价值取向中表现出来的功利追求之强烈，看去同孟郊反复吟颂的“独检踪”、“不自割”、不处“喧竞场”、“面无吝色容”等以道德自持、无欲无争的主张简直相去万里。不过，孟郊自己却未必以为矛盾。从整体上看，孟郊并未因为主张静定不争而抹煞个人欲求，至少对他自己的欲望是肯定的。他的理想是，用道德规范的制约使社会生活宁静有序，个人的欲求则在其中不经争逐即自然而然地得之所以。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功名欲念既强烈，却又如此迂阔不切实际的去求取，孟郊在这泡影般的信念中挣扎、焦虑、痛苦了一辈子，其结果也只能是一场空。“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朝谒大家事，惟余去无由”（《送卢郎中汀》）。吟诗到老，也未能为朝官。本来希望凭借写诗而显贵，岂知反倒身陷困厄。“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写诗倒成了困厄的根由。元和五年以后，他的诗友卢殷、刘言史相继死于饥寒。孟郊写诗哭吊：“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吊卢殷十首》之一）；“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哭刘言

孟郊诗集笺注

史》)。己身的贫困和友人的饥寒使他从普遍的意义体会到诗人的命运多是悲惨的。越中诗僧淡公离洛返越时，孟郊有《送淡公十二首》相赠。据孟郊诗的记叙，淡公自称返越的缘由是“意恐被诗饿”，更不忍留在洛阳目睹孟郊再像卢殷、刘言史一样被饿死。这十二首诗中的最后一首，记述了淡公与孟郊关于诗人命运的对话：

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生空鸩气，非谏复非讥。脱枯挂寒枝，弃如一唾微。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

淡公认为，做一个诗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诗既无用，人又生计无着，像乞丐一样受人唾弃；与其做诗人，不如神驰虚空，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对淡公所云，孟郊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诗饥老不怨”，还不能决心舍弃作诗而“脱空飞”。值得注意的是，证兴亡、补风教本是孟郊信奉的写诗宗旨，淡公却认为诗既非谏净，又不是讥弹，对政教毫无益处，只是诗人徒劳地叹气而已。孟郊对此并无异议，等于默认。虽然不能因此认为他放弃了自己的信念，但是至少可以表明这信念的色泽已经黯淡。

在功名不遂、饥寒交困的境遇中，孟郊的确是日益感到空虚、困惑，内心不免动摇、矛盾。他在《冬日》诗中说：“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游。”把自己的追求和奋斗视为“自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这就意味着曾经被他热烈肯定的以道德自律、以诗补风教和个人功名等价值观念，已经在他心里发生了动摇，对于它们在人生中的实